

海外侨批影响下近代闽南侨乡聚落空间演变研究 ——以漳州角美流传村为例

郑培钰 陈志宏

摘要:自近代以来,闽南华侨远赴南洋谋生,向侨乡汇回大量银钱,推动了侨乡建筑逐渐由传统走向近代化,加速了聚落空间的更新与发展。福建省漳州市角美镇流传村因近代侨批产业发展推动聚落营建,是产业影响下闽南侨乡聚落研究的典型案例。文章从侨批业视角切入,构建侨批业发展时期与聚落空间变迁的联系。通过对官方档案和民间史料的解读,结合田野调研和侨眷的口述访谈,梳理侨批业不同发展时期教育空间、生产空间、公共空间、防御设施、生活空间的发展,并探讨流传村聚落空间演变的动因,以期为产业影响下制定聚落保护发展策略提供借鉴。

关键词:侨批业;侨乡聚落;空间演变;闽南;流传村

doi: 10.3969/j.issn.1009-1483.2025.04.007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章编号: 1009-1483(2025)04-0047-11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Fujia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Busi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Postal Agencies: A Case Study of Chuanliu Village, Jiaomei, Zhangzhou

ZHENG Peiyu, CHEN Zhihong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overseas Chinese from southern Fujian have traveled to Southeast Asia to make a living, returning large amounts of silver to their hometowns. This promoted the gradual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accelerated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 spaces. Liuchuan Village in Jiaomei Tow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serves as a typical case for studying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Fujian's overseas Chinese towns influenced by the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industry, which fueled settlement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usi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postal agencie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is business and the spatial changes of settlements. By interpreting official archives and folk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field research and oral interviews with overseas Chinese relative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space, production space, public space, defense facilities, and living space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industry's development.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village settlement spac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ettlement preservation influenced by industry.

[Keywords] the busi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postal agency;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settlement; spatial evolution; southern Fujian; Liuchuan Village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传统村落保护适宜性技术和活态利用策略研究”课题一“传统村落价值评价及环境风貌控制研究”(编号:2020YFC1522301)。

作者简介:郑培钰,华侨大学建筑设计院(泉州)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助理馆员,福建省城乡建筑遗产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成员。

陈志宏,华侨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城乡建筑遗产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成员。

通信作者:陈志宏,549996582@qq.com。

致谢:感谢流传村郭安谧、郭锦江、蔡运从、郭建华、郭佳鹏等多位老先生提供丰富的民间史料。

0 引言

随着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传统聚落保护形势严峻，聚落的研究也受到普遍关注^[1-2]。早期建筑学领域对于聚落空间的研究更多聚焦在物质层面，围绕不同层级的聚落空间形态展开^[3]。近年来，借鉴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将聚落空间研究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关联^[4-6]，聚落空间的研究框架逐步完善，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但是与经济学交叉视角下的聚落空间研究相对较少^[7-8]。尽管侨汇经济影响下侨乡研究日益受到学者关注^[9]，但是近代以后侨批业对侨乡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却多被忽略。

福建省漳州市角美镇流传村是我国侨批史上闻名遐迩的天一信局所在地，聚落中侨批业从近代起到1967年结束^{①[10]}，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侨批产业的推动下聚落空间经历不同时期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多元化的侨乡村落风貌。本文以流传村为例，探讨侨批产业影响下近代闽南侨乡聚落空间发展，总结聚落空间演变的动因，以期为产业视角下聚落保护发展策略提供借鉴。

1 流传村近代侨批业发展历程

流传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角美镇中南部，地处九龙江下游北港的北岸（见图1）。流传村聚落发展脉络清晰，物质文化遗存丰富；现存清代闽南传统建筑50余处，民国时期闽南传统建筑20余处，洋楼民居9处；其中天一总局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闽南地区知名侨村，流传村出洋的传统由来已久，盛于近代以后，在民国时期达到顶

峰，截至 2015 年，村内有常住人口 3972 人，海外华侨多达 4500 余人^②。

1.1 侨批业初兴期（1840—1891年）

闽南地区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宋元时期泉州港、明朝时期月港均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流传村地处九龙江下游，舳舻相继，有水路交通条件支撑村民进行海外活动（见图2）。随着人口增长，人均耕地减少，加之明清时期天灾战乱的影响，导致村民生活困苦，被迫下南洋谋生。受明清两朝政策影响，华侨无法随意返回侨乡，最后只能客死他乡^[11]。流传村出洋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流传村郭氏族谱中记载了明清时期大量殁葬于海外的族人，仅1840年以前客死南洋的多达111人，遍布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



图 1 漳州市角美流传村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底图引自万历年《漳州府志》龙溪县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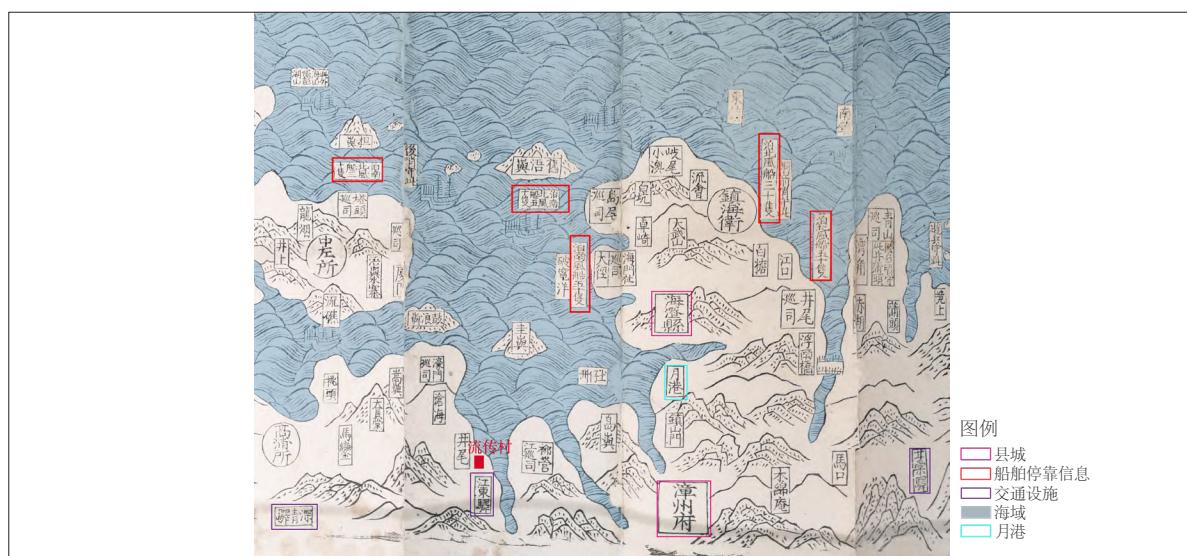


图 2 明代九龙江下游港口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底图引自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藏《明代福建沿海古地图》。

亚槟榔屿、菲律宾吕宋、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吧国（今巴达维亚）、巨港、万丹、三宝垄、知汶（帝汶）等地^[12-13]。大量的华侨跨国活动为流传村侨批业的萌芽提供先决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大量的乡民前往南洋谋生。数量庞大的华侨和频繁的跨国资金流动促进侨批业的发展，流传村开始出现“川走南洋、料理侨汇、带客过番”的水客，例如郭有品、郭围、郭蕃等人^{[3][14]}。水客的经营模式为“走单帮”^[15]，即水客自侨居地收取侨批，亲自携带回国，上门分付给侨眷，收取回批后再前往南洋。水客一年至多能在海外侨居地与侨乡之间往返5~6次^[16]，资金安全更多仰赖水客本人的信誉。郭有品便是流传村水客中的佼佼者，曾在押运过程中遭遇台风沉船，获救后变卖家产赔付给侨眷，因此声名大噪，深受华侨信赖，侨批生意蒸蒸日上^[15]。该时期华侨在海外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工人和店员，尚未完成较大的资本积累，侨汇金额数目相对较少^{[4][17]}，侨批业从业者数量不多，聚落中侨批业尚处于初兴阶段。

1.2 侨批业鼎盛期（1892—1938年）

随着华侨人数的激增，侨批业务不断壮大，水客的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侨批产业的发展，侨批业从业者也意识到“走单帮”的局限性，开始向信局跨国网络模式发展（见图3）。1892年厦门海关成立后，郭有品先后在侨乡厦门和安海、侨居地吕宋设置多个分局，并购置汽船开通厦门至流传、安海的邮路，逐步构建出“收揽—承转—派送”的业务流程，架构侨批跨国网络^[16]。郭有品去世后，郭用中等后人用心经营，不断发展，最终天一信局拥有国内总局1个、分局9个，海外分局24个，辐射东南亚8个国家，成为侨批史上规模最大、营业范围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侨批局^[14]。据统计，天一信局鼎盛期每年收汇高达千万银元，占闽南侨汇近三分之二^[14]，侨汇金额巨大。天一信局聘请同乡族人

担任信使投送侨批，海内外各分局的主持人大多为郭有品的近亲^[15]；鼎盛时期雇用职工高达556人，其中国内163人，国外393人^[18]。蓬勃发展的侨批业为流传村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聚落中出现大量的侨批业从业者。

1928年天一信局倒闭后，仍有大中信局、正大信局^[5]等侨批局在流传村中设置经营点^[15]。值得一提的是，大中信局、正大信局在流传经营点的负责人郭尚俭、郭叔尔^[6]都曾在天一信局担任要职^[15]，由此可见聚落中的侨批业从业者并不因为天一信局倒闭而从事其他工作，而是依旧从事侨批业经营。除了侨批商开设的侨批局外，聚落中水客并没有消失，仍有郭荣山等人从事侨批业经营活动。

1.3 侨批业中止期（1939—1944年）

1938年5月，日本攻占厦门，作为闽南侨批网络的重要空间节点，厦门的沦陷使侨批网络遭受沉重打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切断了闽南侨乡与东南亚的海上通道；随后，香港和东南亚等地相继沦陷，华侨饱受迫害，经济遭受重创^[16]。东南亚动荡的局势严重削弱海外华侨的汇款能力^[7]，受战争影响，水客无法进行跨国活动^[8]，侨批局业务也被迫中止，侨汇中断。

根据相关资料对流传村现存建筑进行历史分期，尚未发现在1939—1944年建设的建筑。由此可见，在侨批业中止期，华侨建设暂时停止，聚落发展陷入停滞的状态。

1.4 侨批业衰落期（1945—1967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侨批的海上运输通道恢复，但战后东南亚出现大规模的排华，禁止华文报刊和教育，重要工商行业对华侨进行限制和禁止，甚至将华侨驱逐出境^[19]。由于东南亚政府严格管控侨汇的流出，加之侨居地政治动荡、经济不景气，使得华侨汇款大幅度减少^[16]；聚落中的侨批业逐渐衰落。1967年，私营侨批业不复存在后，聚落中的侨批业基本停止。侨批业衰退期与鼎盛期相比，聚落营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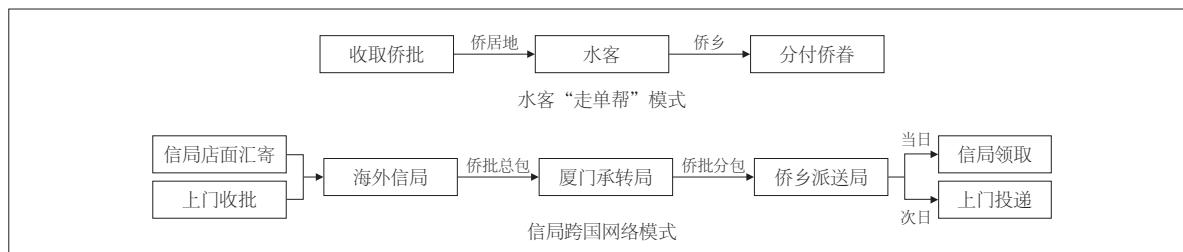


图3 天一信局侨批经营模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的数量锐减，建设类型为大厝和洋楼，类型上没有新增，建设的闽南传统大厝规模小，建设的洋楼数量少；整体聚落空间发展缓慢（见图4）。

战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对侨务工作十分重视，加之海外侨居地政策影响，海外华侨返乡意愿较高，因此该时期以华侨携款返乡建设为主，侨居地大多为印尼。大多数返乡的华侨生活贫苦，主要以建设单落三开间的闽南传统大厝为主；个别富裕华侨返乡建设独立式洋楼，并积极投资^{⑩⑪}（见表1）。

2 流传村传统聚落空间特征（1840年以前）

流传村始建于唐代，是以郭姓为主的宗族聚落，聚落中民间信仰兴盛。受清代迁界事件影响^{⑫⑬}，聚落内的建筑皆为复界后重建。至1840年，聚落中便已建成了“九庙十祠堂”，此外还分布有大量民居；受水系影响，聚落空间布局较为松散（见图5）。

流传村自唐代郭氏始祖十二使公定居于此，筑溪成田，繁衍后世。因元末水灾，聚落冲毁、族人四散，后世遂以重回流传的天德、天聪、天恩、天惠、天懿五兄弟为一世祖。至1661年清政府下令迁界^⑭，流传村亦在其中^⑮，族谱^⑯也提及这段境遇“辛丑迁移之后，室被兵火，人皆兽散”，可见对聚落破坏之大；1683年展界，郭氏族人重回流传村，聚落展开新一轮的建设。虽然经历2次重建，但是聚落中宗族结构脉络清晰，至1840年已衍传至第十七世，并建设了1座宗祠、4座房祠、5座支祠^⑰（见图6）。

除宗族结构以外，聚落中还存在另一套系统——民间信仰。聚落中民间信仰囊括了三元真君、神农大帝、炎黄二帝、妈祖、福德正神、蔡妈夫人、观音、辅胜将军李伯瑶暨金德夫人等神明，主要的神职包含了祈雨治水、护境佑民、御寇弥盗、保护



图4 1945—1967年流传聚落建设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1 华侨返乡建设民居类型

类型	时间	建设者	侨居地	建筑外观	建筑平面
大厝	1950—1960年	郭智模	印尼		
洋楼	1948年	郭尚本	印尼		
	1957年	郑俊德	印尼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自摄。

航海、除疾消灾等，这与流传村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活动、历史沿革息息相关。流传村所在的闽南地区受台风影响时有洪涝灾害，因此聚落中信奉三元真君等水神¹⁴；聚落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依靠筑堤障潮引淡水灌溉的埭田进行农业生产，遂盛行神农大帝、福德正神等信仰；清代后下南洋人数激增，船难时有发生，聚落中兴建广慈宫以供奉妈祖¹⁵；至清中叶，聚落中便已架构起较为完整的民间信仰体系¹⁶。

近代以前聚落中民居可分为闽南传统大厝和石楼2种（见表2）。对比石楼和闽南传统大厝，从平面格局上看，石楼是闽南传统大厝的“楼化”，但墙体更厚；石楼开窗尺度相比于大厝而言较小，整体较为封闭，有较强的防御性¹⁷，通风采光条件较差，居住舒适性欠佳。受清代迁界事件影响，村民返乡后对居住建筑的防御性有较高的要求，因此石楼的建设仅出现在复界返乡的初期，而闽南传统大厝在聚落中持续建设。



图5 1840年流传村传统聚落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自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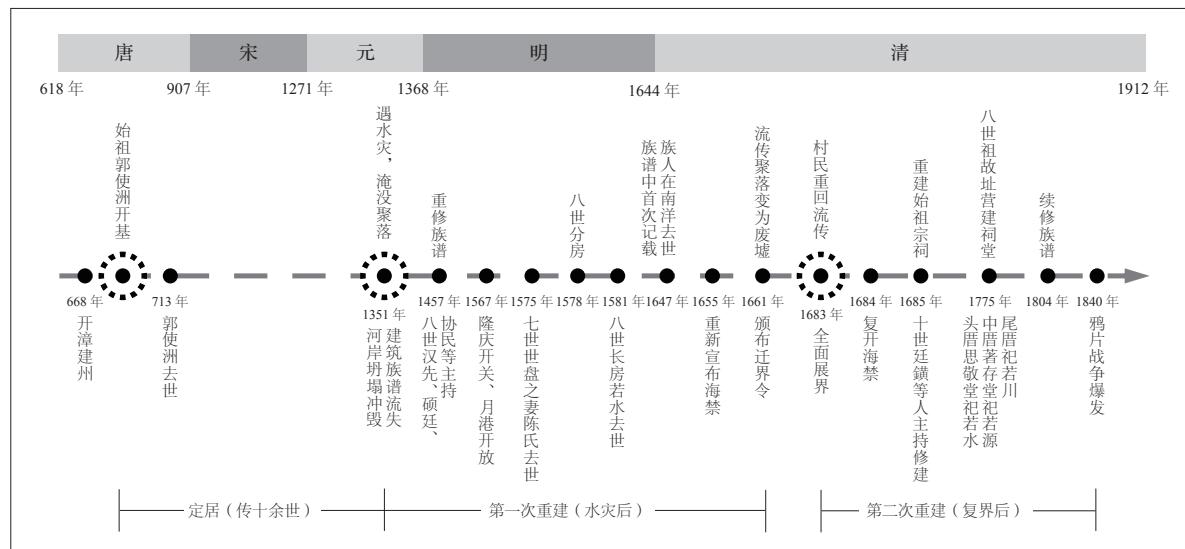


图6 流传郭氏发展图

注：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2-13]内容梳理绘制，其中对始祖郭使洲开基时间没有明确记载。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 侨批业初兴与聚落传统空间的延续(1840—1891年)

当地至今都流传的一句俚语：“过蕃边去探大钱，起大厝来娶水某”^⑧，可见当时华侨下南洋只是迫于经济压力暂居海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他们依旧选择回到家乡建设房屋和组建家庭。在侨批业初兴时期，华侨主要通过水客将侨汇输送回侨乡，侨汇为侨乡聚落空间营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推动聚落空间的发展，使得水客、海外华侨与本地村民一起成为聚落建设的主体，共同参与空间营造（见图7、表3）。

传统聚落中的石楼为特殊时期的产物，闽南传统大厝的建设才是持续不断的。在侨批业初兴时期，本地村民在进行民居建设时依旧选择延续传统，营建闽南传统大厝。此时，中外交流尚不频繁，聚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尚小，流传村华侨也同样选择建设闽南传统大厝。华侨返乡除了建设民居外，还通过重修宫庙^⑨、捐资请戏等方式参与侨乡传统的公共事务。尽管长期的跨国生活使水客具备国际化视野，但他们的建设与聚落中的其他民居建筑并无太多差异。1840—1891年，聚落中尚可追溯到水客返乡建设有2处，一处为郭围宅，另一处为郭蕃宅。

2处建筑都是沿用传统的平面形式和功能布局，在形式上遵循闽南传统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均采用本地，尚未出现“洋化”的探索。梳理这3类人群在聚落中的建设，可以看到该时期聚落建设依旧采用闽南传统大厝建筑样式，运用红色板瓦、双坡屋顶、燕尾脊、花岗岩条石墙裙、壳灰砂浆墙体抹面等元素，延续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

侨批业初兴阶段聚落中仅有零星几位水客，从事侨批业经营的人数较少，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未新增侨批业相关的生产设施。聚落中的本地村民、华侨、水客均选择建设闽南传统大厝，从建筑形式、建筑材料上看，与传统聚落中的民居并无太大的区别。

4 侨批业鼎盛期与聚落空间发展(1892—1938年)

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宽，加之侨批业发展需求，聚落中下南洋的人数激增，据村中耄老所言，该时期流传村中“家家下南洋，户户有华侨，人人都有海外亲戚”，此时华侨成为聚落建设的主体^⑩。该时期除了建设传统大厝和重修宫庙以外，新式学堂、侨批局、新式花园、铳楼、洋楼等空间陆续在聚落中落地，丰富了聚落的构成要素，推动聚落空间的



图7 1840—1891年流传聚落建设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2 石楼和闽南传统大厝民居对比

类型	实例	平面格局	建筑外观	细部尺寸(mm)
石楼	辰远楼	一层平面图		条石墙裙高度：2980
		二层平面图		外墙厚度：710
				开窗尺寸：320/500
闽南传统大厝	大房旧厝			条石墙裙高度：1230
				外墙厚度：320
				开窗尺寸：62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自摄。

更新(见图8)。

4.1 教育空间: 侨批业人才培养需求下新式学堂的建设

1898年天一信局郭有品在流传村中兴办义塾, 受1901年“科举改制”政令的影响, 国内开始进行

教育改革^[23]。1905年郭有品之子郭行钟着手对义塾进行改制, 新建教室及校舍, 创办流传初、高两等小学堂; 与义塾推行的传统教育不同, 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不仅“以忠孝为本, 以经史为基”, 还开设了“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



图8 1892—1938年流传聚落建设空间分布图

注: 带*建筑为侨批局。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自摄。

表3 侨批业初期3类人群聚落民居建设

人群	本地村民营建	海外华侨营建	水客营建		
案例	流传173号(头社旧厝)	流传184号(启智大厝)	流传557-1号(郭围宅)		
建筑平面	 一层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建筑外观					
建筑材料	 红色板瓦	 杉木	 壳灰砂浆	 乌烟灰砂浆	 花岗岩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自摄。

操等”课程，在侨乡引进西方教育培养体系；1921年天一总局又将旧办公楼捐出，用于扩建教室，并成立龙溪县七区第一私立流传女子国民学校^[14]，推动了聚落教育空间的更新。

侨批商创办新式学堂，不仅是因为华侨热衷于参加地方公共事业，还有出于侨批业长足发展的考虑。在侨批业经营过程中投递侨批的“批脚”通常为同乡族人，“批脚”不仅需要身体强壮，更需要识字、懂算术，但在闽南传统乡村聚落中识字的村民数量非常有限。侨批商兴办的新式学堂数量少，但课程设置，有利于同乡族亲具备“批脚”所需的技能，为侨批业后续的发展储备人才。

4.2 防御设施：侨批业安全生产需求下铳楼的建设

与聚落中蓬勃发展的侨批业不同，该时期闽南地区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抢劫归侨之事时有发生^[21]，防御形势较为严峻。为保证侨批业的安全生产，保障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流传聚落外围兴建大量的铳楼^[22]。以聚落中现存的天一信局郭有品家族所建铳楼为例，地处于聚落外围，便于防御外敌；矩形平面格局，四层砖木结构，除每层的瞭望窗以外，二层以上的墙身散布着“外小内大”的枪孔用于射击。铳楼的建设，有利于缓解大量侨汇的涌入给聚落防御带来的巨大压力，也推动聚落防御设施的更新。

4.3 生产空间：侨批业经营模式变化下侨批局的建设

侨批业最初的经营模式是水客“走单帮”，侨批业跨国网络建立后，经营模式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侨居地收揽侨批—通商口岸承转—侨乡解付派送”一整套系统的流程^{[23][15]}，业务经营有了固定的地点，侨批局应运而生。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1906年聚落中最早的侨批局宛南楼在郭用中的主持下开始建设，兴建这座涵盖居住、办公功能为一体的建筑，不止是侨批商出于侨批业新运营模式的需求，也是希望通过坚固可靠的建筑形象来表现其雄厚财力，获得更多华侨和侨眷的信任。1911年郭用中聘请德国设计师为天一总局设计办公业务经营大楼，历时10年，“北楼”和“陶园”落成^[24]，这2处建筑一层用于业务经营，二层用于居住，均采用外廊式平面格局，红色板瓦屋面，立面采用了水刷石饰面，为闽南近代洋楼样式。

4.4 公共空间：侨批商主导下新式园林的建设

1921年建成的陶园中除了一座洋楼用于邮政办事处外，还在建筑北侧设计了一处占地面积约3000m²

的新式园林，无偿面向公众开放（见图9）。园中不仅有假山、鱼池、六角亭等传统园林的构成要素，还运用火焰门等西方园林的装饰构件，体现了华侨园林中西交融的特点，为聚落增添了新的公共空间。

4.5 居住空间：侨批商推动下洋楼建筑的发展

侨批商不仅受侨乡社会文化的影响，长期的跨国生活使他们具备国际化的视野，不仅建设中西交融的新式园林，也引领了聚落中洋楼建筑的变迁。虽然前期聚落中有华侨在大厝的基础上进行“叠楼”尝试，但聚落中最早的洋楼是天一信局郭有品家族于1911年建成的宛南楼，在后续聚落的洋楼建设中，侨批商也占据了主导地位^[25]。侨批商的洋楼营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局部大厝后落洋楼逐步向独栋式洋楼转变（见表4）。在建筑材料方面也进行革新，开始出现水刷石、水泥等舶来品。洋楼的建设历程体现了侨乡社会对于外来建筑元素的融合过程，也映射出近代侨乡社会文化的变迁。

5 近代聚落空间演变的动因

近代以后，聚落营建与侨批业发展密切相关，侨批业的侨汇数量、产业发展需求对聚落营建的历程有较大的影响（见图10）。

5.1 经济：侨汇的数量影响聚落空间发展进程

侨批业初兴期，华侨在海外尚未完成较大的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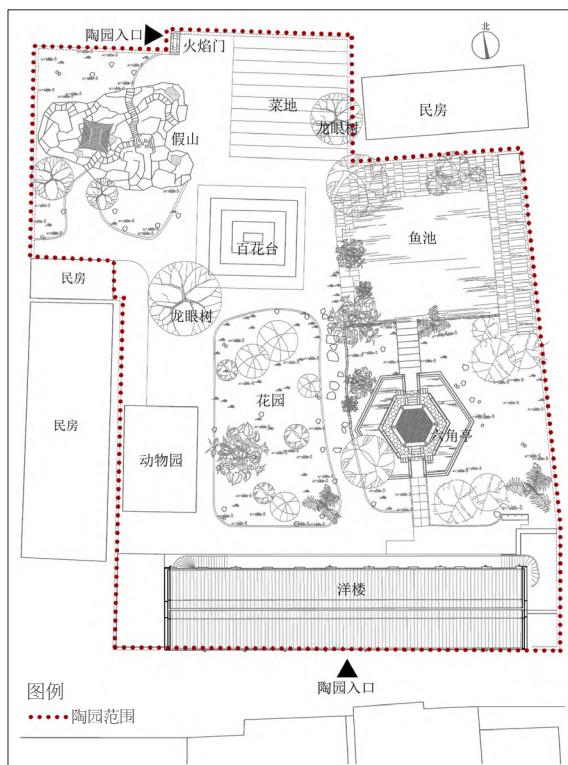


图9 陶园复原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底图来源于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历史教研室。

本积累，通过水客向侨乡输送的侨汇金额较少，聚落中仍保留一部分农业经济。海外华侨与本地村民一起参与聚落建设，共同推动聚落空间发展进程，速度明显加快。侨批业鼎盛期“家家下南洋，户户有华侨”，侨批业发展迅速，通过侨批局寄回的侨汇数量巨大，大量侨眷脱离了劳动生产，经济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侨汇经济成为聚落中的主要支撑。华侨成为聚落建设的主力军，聚落空间营建呈现多类型的爆发式增长。侨批业中止期，侨汇中断，营

建活动停止，聚落空间发展停滞。侨批业衰弱期，受战争和东南亚侨居地政策影响，侨汇数量骤减，建设数量随之下降，建设类型也不再新增，聚落空间发展缓慢。由不同时期聚落空间发展的情况看，侨汇的数量影响聚落空间发展进程。

5.2 产业：侨批产业发展推动聚落空间的更新

侨批业初兴阶段，从业者数量较少，聚落中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未新增侨批业相关的生产设施，建筑类型、建筑材料等方面无明显变化，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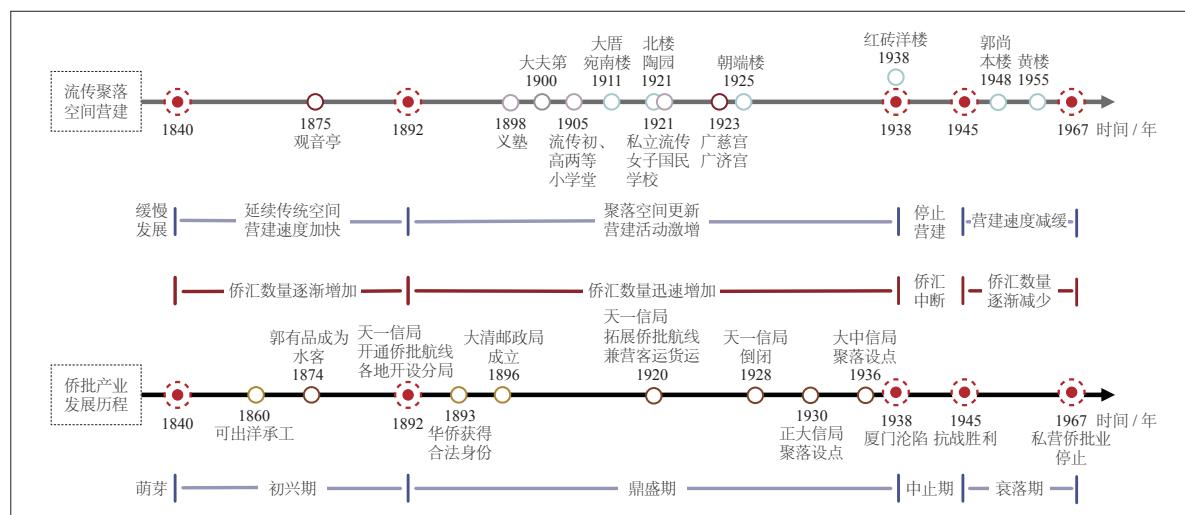


图 10 流传聚落营建与侨批业发展

注：本图仅体现有确切建设时间的建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4 洋楼建筑的发展

类型	传统大厝护厝局部叠楼	传统大厝后落洋楼	独栋式洋楼
案例	流传 259 号	宛南楼	北楼
建筑平面	<p>流传 259 号</p> <p>一层平面图</p>	<p>宛南楼</p> <p>一层平面图</p>	<p>北楼</p> <p>一层平面图</p>
建筑外观			
建筑材料	<p>红色板瓦</p>	<p>杉木</p>	<p>壳灰砂浆</p>
			<p>水刷石</p>
			<p>水泥</p>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自摄。

批业对聚落空间影响尚未凸显。跨国网络构建后侨批业高速发展，大量侨汇的涌入给聚落防御带来了较大的压力，推动铳楼的建设；经营模式的变化，使得业务经营有了固定的地点，推动侨批局这类建筑在聚落中诞生；应侨批业人才培养需求，推动了聚落教育空间的更新；但侨批业的影响不止于此。因侨批业发展的需要，天一信局购置汽船运输侨批，同时兼营货运和客运经营^①^[15]，聚落水路交通系统不断完善，为建筑材料的运输奠定了基础条件，为实力雄厚的华侨直接从海外寄回洋楼的建筑材料^②提供了运输渠道。在设计方案上，聚落中早期洋楼都是华侨从海外侨居地寄回图纸^③，蓬勃发展的侨批业也为图纸的运输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促进洋楼建筑在聚落的诞生。

5.3 政治：华侨身份逐渐合法化促进建筑洋化

晚清以前，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弃民”，进入近代以后，清政府的政策逐渐放松，华侨前往海外谋生逐渐走向合法化，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阻挡出洋承工，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签订后华侨可随时往来各国，1893年《请豁除海禁招徕华民疏》废除华侨海禁，无论出洋时间长短，可随时回国^[16]。在侨批业初兴时期，华侨尚未获得合法身份，在聚落中的建设行为较为保守，建造一座传统大厝更符合当下的历史环境，因此华侨返乡建设以大厝为主。到了侨批业跨国网络构建时期，华侨身份合法化以后，他们的建设行为才愈发大胆，开始建造“洋化”的建筑，促使番仔厝、洋楼等带有外来元素的建筑在聚落中落地。

6 结语

近代侨批业的发展对流传村传统村落风貌特征产生较大影响，推动聚落中教育空间、生产空间、公共空间、防御设施、居住空间的更新。聚落空间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形成了多层次的侨乡聚落风貌。侨批业初兴时期，华侨受身份和思想文化的禁锢、建设资金和建筑材料的限制，营建依旧以传统建筑为主，延续了聚落传统的空间形态。侨批业鼎盛期，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加深，随着华侨身份的合法化与侨批业跨国网络的建立，大量侨汇涌入侨乡，在侨批业发展需求与侨批商的引领下，新式学堂、铳楼、侨批局、新式园林、洋楼等建筑陆续在侨乡落地，聚落空间得到进一步更新。侨批业中止期，侨汇中断，聚落营建也相应停滞。侨批业衰落期，受侨居地的政策和局势影响，侨汇数量锐减，营建

数量较少，以闽南传统大厝和洋楼为主，聚落空间发展减缓。

产业是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巨大推动力，立足于产业视角来解析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对探究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未来发展策略，以及乡村聚落保护研究都意义重大。产业振兴是乡村聚落发展的源泉，通过产业视角下乡村聚落空间研究，为乡村聚落保护提供可持续规划建设的理论依据，让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激发内在动力，推动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

注：

- ① 1967年中侨委下达了《进一步对侨批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67]206号)文件，侨批业开始实现统一领导、统一核算、统一经营、共负盈亏，至此侨批业的私营性质不复存在。
- ② 数据来源于流传村前书记郭锦江先生在2015年的统计。
- ③ 天一信局创始人郭有品在经营侨批业之初也是水客，自1874年开始前往吕宋，受华侨委托携带银信回国，至1880年成立“天一批郊”后每批银信仍然由本人亲自押送回国。郭围居住于流传新街尾，当地人称“番客围”，是19世纪流传所在的东美地区有名的水客。郭蕃居住于流传头社，据其后代所述，他不仅携带银信，还当客头带人过蕃，当地人称他为“蕃客头”，比郭有品更早从事水客，与郭有品同属流传郭氏大房。
- ④ 19世纪中后期大量闽南人下南洋，通过被“卖猪仔”或契约移民到东南亚的城市、矿山或农村的种植园工作，也有人成为小商贩，走街串巷，他们在海外谋生逐渐积累资本，大约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较大的资本积累。
- ⑤ 郭尚深负责大中信局在新加坡的经营点，该经营点在1936年11月成为正大信局在海外的分联号。1930年正大信局由流传社郭亦周先生创办。
- ⑥ 郭尚俭曾在天一信局担任会计。郭叔尔曾任漳州天一信局的主人。
- ⑦ 2022年2月5日笔者访谈流传村中年近90岁的侨眷郭溪草，他回忆道“那个时期南洋回不来，这边也过不去，联系中断了，(华侨)在南洋也不好过，日本(侵略者)喊打喊杀的，(华侨)生意也不好做，没有钱寄回来，厝内也没有(生活)来源”。
- ⑧ 漳州地区海澄县楼埭乡金鳌村水客杨自求在自述中提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起矣，不能往也”。详见漳州市龙海区档案馆馆藏《第五区归国华侨调查表》，全宗号0110，案卷号17。

- ⑨ 根据对聚落内侨眷的访谈，他们反复提及该时期返乡的富侨郑俊德曾投资国营双第华侨农场的前身——公私合营双第华侨农场。该农场是1955年为了开发山区安置归侨侨眷就业，由华侨集资兴办的小型农场；1960年2月为了适应大量安置归侨的需要，正式扩场改为国营龙海双第华侨农场。
- ⑩ 1661年，清廷正式颁布迁界令，迁徙沿海居民于内地。
- ⑪ 迁界范围根据清康熙元年沿海迁界图确定。
- ⑫ 《榴阳次房族谱》，1685年编撰，1811年重修，现为流传村郭建盛宗长收藏。
- ⑬ 宗祠为追远堂，祠存有存敬堂、思永堂、三房祠堂、五房宗祠，支祠有世敬堂、著存堂、尾厝祠堂、新街尾小宗、燕南堂。其中五房宗祠文革时期被改造成仓库；世敬堂、著存堂、尾厝祠堂、燕南堂均已损毁，仅留部分墙基。
- ⑭ 根据流传村前书记郭锦江所著的《流传村风土人情》，明朝时聚落南岸受洪水冲击而堤崩，屡修不固，遂迎奉玉江三元庙三元真君的金身来坐镇庇护，终于成功修好全堤。以卜筮拜请真君归祖庙却不得允准，于是民众集资在坐镇地兴建庙宇。
- ⑮ 广慈宫碑刻上记载“先祖为尊敬圣母，塑其金身，于清朝中叶建造广慈宫，供奉圣母娘娘”。据《榴阳郭氏族谱》中所记载：“十三世廷宙公……卒于乾隆三年戊午七月廿二日亥时因回吧在船于广东港口沉破遂亡焉，寿四十……”“十四世锡章公……卒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七月初七酉时因回吧在船失事……”，两次船难中均有数位族亲丧生，族谱中记载郭氏族人下南洋途中遭遇的两次船难也正是在清中叶。
- ⑯ 根据聚落中宫庙中保存的碑刻中记载的始建年代统计，大量始建于明末清初，最晚为清中叶。
- ⑰ 根据村中老人口述，建国之前聚落中还保存有十余座石楼，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被拆除。流传村中现仅存4座石楼，石楼建筑的平面布局与闽南传统大厝相似，为“四房看厅”格局，通往二层的楼梯设置在后轩；一层墙体采用条石砌筑，二层墙体采用砖砌，表面涂抹壳灰砂浆，一层的开窗面积与二层相比较小；马鞍脊红色板瓦屋面。
- ⑱ 闽南语的俚语，大意为“去到海外挣大钱，（回来）盖大厝好娶漂亮老婆”。
- ⑲ 观音亭中碑刻记载了1875年重修。
- ⑳ 根据对流传村中现存房屋的建设情况统计，1892—1938年建设的房屋全部为华侨所建或受侨资支持。
- ㉑ 根据澄码石角东海外华侨公会1940年7月27日的《据请函转即希查照迅予严追究办由》中记载，1940年6月22日深夜，海澄县第二区白南乡楼埭保霞美社荷属巴东归家的侨商李有源遭遇抢劫，匪徒十余猛，明火执械，撞门入内，洗抢首饰、银物，扬长而去；为此澄码石角东海外华侨公会致函海澄县政府要求迅予追查抢劫犯。详见《据请函转即希查照迅予严追究办由》，漳州市龙海区档案馆馆藏，全宗号0237，案卷号36。
- ㉒ 铳楼，当地人也将其称为碉楼，与开平碉楼不同的是，流传当地碉楼主要功能是防卫，仅用作瞭望、守卫之用，并不具备居住功能。根据村中多位耋老回忆，聚落中原有铳楼十余座，多数由富侨建设，因年代久远坍塌，兴建现代房屋时便将其拆除。
- ㉓ 根据天一信局的运作流程总结。
- ㉔ 2020年11月8日笔者访谈时，徐慧宝女士口述，徐慧宝是郭有品之孙郭尚鑑之妻。
- ㉕ 根据对聚落中现存洋楼主人身份的统计，仅朝端楼与黄楼的主人不是从事侨批业，其余洋楼的主人均为侨批商。
- ㉖ 天一信局在1892年便自行购置汽船，开通厦门至流传的侨批专用航线；1920年之后，又陆续购置南太武、正太武、鸿江3艘汽船，经营线路为卓崎—厦门、石美—厦门，经营内容也扩大到客运和货运。
- ㉗ 宛南楼的“洋灰”（水泥）从菲律宾寄回，北楼、陶园二层栏杆从法属殖民地寄回；朝端楼“洋灰”（水泥）、主入口木质板门和正厅寿屏所用的木材，均从菲律宾寄回。
- ㉘ 聚落中现存8座洋楼中大部分都为海外侨居地回寄图纸，仅最晚建设的郭尚本楼（1948年）和黄楼（1957年）为本地工匠直接施工建设。

参考文献：

- [1] 罗德胤,孙娜,付啟诺.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的松阳路径[J].建筑学报,2021(1):1-8.
- [2] 冯亚芬,俞万源,雷汝林.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科学,2017,37(2):236-243.
- [3] 聂湘玉,张琰,孙立硕,等.传统村落类型与价值认定——以河北石家庄市域传统村落为例[J].规划师,2015,31(2):198-202.
- [4] 黄颖敏,李晴,廖望,等.尺度政治视角下传统村落祠堂功能演变与动力机制——以江西唐江卢氏宗祠为例[J].南方建筑,2024(1):38-47.
- [5] 何依,孙亮.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村落院落单元研究——以宁波市走马塘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例[J].建筑学报,2017(2):90-95.
- [6] 叶梦婷,杨小军,李永浮.协同视角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规划策略研究——以永嘉县屿北村为例[J].小城镇建设,2024,42(6):91-97.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4.06.012.

(下转第65页)

- [11] 黄雪芹,邢旭.传统协商治理:东北移民村的实践[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4(5):59–70.
- [12] 徐娅楠.关系建构:闯关东移民村落秩序生成的进路与逻辑[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3.
- [13] 李卓.中朝边境三合村朝汉民族交融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2.
- [14] 洪瑶.多元文化视野下延边地区山东移民居住文化变迁研究[D].长春:吉林建筑大学,2023.
- [15] 吕静,张恒怡.东北地区乡村聚落时空分布形态变化研究——以近400年来各民族迁移路线为依据[J].重庆建筑,2017,16(1):8–11.
- [16] FANG X Q, YE Y, ZENG Z Z, Extreme Climate Incidents, Migration for Cultivation and Policies: A Case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f China[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Earth Sciences),2007,50(3):411–421.
- [17] 郝素娟.中心辐射与边边互动:金初女真人东北地区迁徙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4):81–88.
- [18] 孙明.清代东北满洲旗人的迁徙及其影响——以家谱为中心的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2017(2):132–138.
- [19] 陈鹏.清代东北地区锡伯、卦尔察“新满洲”编设及迁徙探析[J].欧亚学刊,2008(10):176–189.
- [20] 李同予,薛滨夏,白雪.东北汉族传统民居在历史迁徙过程中的型制转变及其启示[J].城市建筑,2009(5):104–105.
- [21] 赵兴元.日伪统治与朝民向中国东北的迁徙[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5):36–39.
- [22]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
- [23] 薛虹,李澍田.中国东北通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24] 姜维公.中国东北民族史(下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
- [25] 肖忠纯.辽代辽西走廊的考古遗址与社会发展[J].农业考古,2014(4):89–93.

收稿日期: 2024–08–03

(本文编辑: 朱峰)

(上接第57页)

- [7] 赵逵,张晓莉.盐业经济影响下的淮南场治聚落空间演变[J].新建筑,2023(1):147–151.
- [8] 赖慎薇,林翔.产业驱动下的南山传统村落当代空间演变研究[J].小城镇建设,2023,41(12):67–76.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3.12.010.
- [9] 郭焕宇.近代侨汇经济影响下广东侨乡聚落的阶段建设[J].山西建筑,2014,40(20):7–9.
- [10] 程希.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侨批业之视角[J].东南亚研究,2016(4):80–96.
- [11] 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J].近代史研究,2010(2):62–75,3.
- [12] 流传郭氏宗族.榴阳郭氏族谱[Z],1804.
- [13] 流传郭氏宗族.榴阳次房族谱[Z],1881.
- [14] 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泉州市档案馆,泉州学研究所.回望闽南侨批[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
- [15] 黄清海.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6] 焦建华.福建侨批业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 [17] 焦建华,李梦青.华商跨国网络与近代厦门城市发展——以闽南侨批网络为中心[J].学术月刊,2023,55(11):189–197.
- [18] 黄清海,等.闽南侨批史纪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 [19] 庄国土.文明冲突,抑或社会矛盾——略论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与当地族群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70–77.
- [20] 吴文智.从双第华侨农场的发展看福建华侨农场的发展和未来前景[D].厦门:厦门大学,2002.
- [21] 刘宇勋.清初福建沿海的复界与地方社会[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 [22]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历史地图集[M].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
- [23] 曹南屏.“考试不足得人才”:清末科举改制与出版市场的互动及其影响[J].近代史研究,2018(5):105–121.

收稿日期: 2024–08–01

(本文编辑: 朱峰)